

電子傳媒





呂秉權

訪問時間：2015年4月22日

呂秉權（Bruce LUI），前香港無線電視和有線電視中國組記者，主要採訪中國新聞，曾參與2008年汶川大地震採訪，現為浸會大學高級講師，代表作包括：《農民自資拍片》、《核試遺害》的調查報道。



香港的無綫電視和有線電視兩大公司分別是收視率最高的免費及收費電視台。隨着新媒體的迅速擴散，觀眾可選擇的信息平台不斷增加，香港電視業的競爭變得日趨激烈，深入報道從邊緣走入了中心，成了電視的「搶手貨」。回歸後的香港傳媒愈來愈多地把視線放在兩岸三地的重大事件上，查找事件之間隱含的、內在的聯繫，故事源頭挖得愈深，愈有可能觸動港人的神經。呂秉權是香港傳媒工作者中的佼佼者，獲得過本地所有的新聞獎，當年他以香港記者的身份，走訪中國各省份，了解國情，報道時事，作為經驗之談，他認為挖掘故事背後的故事更有意思，結果更發人深省。創意，在於思考，尋根究底的精神帶你透過現象走向事件的本質，他的報道，如《中國鬥雞故事》、《農民自資拍片》、《魚蛋無魚、牛丸無牛》、《核試遭害》等都得到觀眾的迴響。他認為大膽假設、仔細觀察、不斷思考，才能夠成就出色的新聞故事，不僅如此，好的新聞故事更會帶領讀者思考。在香港寫中國內地的故事看來沒有什麼掣肘，但要在中國採寫新聞故事，作為一個不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只有拼命發掘，巧妙尋找才能獲得有價值的線索。

呂秉權是新聞系本科畢業生、新聞系在讀博士生、做過報紙記者和編輯、當過電視台新聞節目主持人、現全職從事新聞教育，多次獲得新聞界的殊榮和大獎。他的經歷使他成為一個「全方位」的新聞人，這是本書以他的訪談作為開篇的主要原因。

問：你是如何鋪排電視新聞故事的？

答：做新聞的沒有一個特定的格式，如 5W1H（What 什麼，Where 何地，When 何時，Who 何人，Why 為何，How 如何），我的想法是首先發掘別人未曾做過的新聞，即使做同一宗新聞都希望盡量做得比別人多些。如果你和別人做同一宗新聞，出來的成品又一模一樣，那基本上就不用看了，看一個就等於看了 100 個。所以我對自己的要求是一定要與別人不同，題材及其他各方面都要獨特。至於怎樣去組織故事，首先那個新聞真的要有新的地方，其次，新聞的重要性及趣味性也不可忽略。當然有些故事未必有趣，但有新的因素是重要的。有特質即是有趣，我們要將一些基本和重要資訊清楚地表述出來，除了讓人們知道新的發展，還希望他們思考問題，有一些能啟發他們的東西，而非「水過鴨背」。

例如，我曾做過一宗關於幾個來自青海的牧民在香港遇到詐騙的新聞，當時在香港引起小小風波。有人認為他們抹黑了香港旅遊的形象。但背後的故事是，那些牧民省吃儉用不知「賣了多少頭羊」才能到香港旅遊。當時我就負責在內地跟進他們的情況。那個故事主要講這班牧民雖然受了屈辱，但回去並沒有抹黑香港，而是說忍過去就算了。我覺得他們之所以這樣想，原因是他們厚道，也可能有官方的人曾找他們談過。這宗新聞就只有我們跟到最後。我在文章中說，這幾個牧民厚道，他們保護了香港的旅遊形象，可是再想深一層，香港是否應該有法律和制度保證遊客權益免受侵害才是正確的呢？我通常會在新聞中提出反省或一些盡量令人思考的東西。

另一個例子，內地不少富家子弟是「逃學威龍」、不肯讀書，於是被父母安排去軍訓，受「虐待」，希望藉此使他們清醒。我在報道結尾時提及現在社會進步，物質條件改善，但令人深思的是豐富的物質條件不一定能令年輕人「成龍成鳳」。我特意

採訪了負責軍訓的教官。這些退伍軍人出身於農村草根階層，從沒想過現在要這樣「虐待」富家子弟。他們認為，如果自己是個富家子弟，一定不會這樣不上進，不會如此不珍惜自己家庭所給予的好條件，不會這樣辜負父母。我用這個方法去推動觀眾思考有關問題。

問：你怎樣尋找新聞來源？

答：這個面很寬，幾方面都有。我有一些相熟的朋友，定期會聚餐或打球，各人圈子裏所發生的事基本上都會告訴你，包括最新動向。因為是朋友和信得過的關係，他們會告訴你他們現在在做什麼。比如關於一宗法庭新聞，他們認為哪些文件重要等，我們都會交流。另外，更多的是留意身邊的人和事，以及上網搜尋。例如我住在上海，每日或者定期我都會在電子新聞（WiseNews）或者百度新聞上搜查，只是簡單打「上海」兩個字就會出現很多沒有關係的垃圾，我就「飛得很快」，但有時你也會在這些「垃圾」中看到一兩條有意思的題目，我們平日會錯過，主流社會也不會報道，或只是以大眾化的角度報道，你就可能從中「翻出」一些東西來。例如那時我看了一些感動中國的人物報道。

這些感動中國人物中有一位婆婆，專門收留出獄的釋囚。那些釋囚因為長時間坐牢，加上家中貧窮，有的已被家人離棄，出獄後難以融入社會。這位婆婆便收留他們。那個報道講述婆婆的人性光輝，怎樣普渡眾生等。我仔細深入看，發現婆婆家在山西，但收留的人卻來自世界各地，而且數以百計，還有監獄局轉介一些釋囚給她。我覺得不對勁，這些幫助釋囚重新適應及投入社會的工作應該是政府責任而並非一位老婆婆。政府濫用了這位婆婆的好心，源源不絕地送上釋囚，又無任何補貼。我又去了解為什麼這些釋囚如此難以融入社會，而原因正是政府沒有有效跟進他們出獄後的新生活。當時，釋囚的重犯率逐

年顯著上升。我發現背後的問題是政府管理及善後得不好，使釋囚難以融入社會。政府不跟進，反而數以百計地推到婆婆那邊。如此便成為一個新聞題材。我覺得這背後的故事比受到讚頌的感動中國的人物故事更值得探討。

另外，新聞來源還包括一般的社交場合，我平時會留意日常生活，例如會去新開的展館、展區等。比如很多年前，我有一次路過一間「餐吧」，看到狗在內進食，詢問後發現那是全國首間寵物餐廳，為狗提供食物及專用食具。總之，很多元素都能刺激到我找新聞。

問：你的工作經驗如何幫助你進一步發掘新聞？

答：我於 1997 年開始在無綫做實習記者，1998 年轉為正職，一直工作到 2005 年，期間由本地新聞、記者會、基本故事等做起，後來就開始做華南新聞，主要是廣東一帶。工作兩年多後開始駐北京，差不多每年都有幾個月在那裏，其餘時間則出差，同樣以跑內地新聞為主。2005 年底轉至有線工作，直到 2012 年。在有線都是負責內地新聞，另外也拍攝專題。補充一下，在無綫時我也做過港聞和主播。

早期上網不怎麼便利時，我們會翻閱剪報，閱覽所有與某個特定新聞人物相關的文章。如果時間充裕，我們還會到外面的圖書館找資料。比如我要做關於寵物的故事，就會在正式採訪前打電話給一些動物方面的專家。如果是爬蟲類的新聞，我就去金魚街、爬蟲類店舖，詢問有關專業知識。有電腦上網後就方便得多，大部分資料都可在網上找到，如果想知道更多，就打電話請教該方面的專家。一開始見到題目，我大概會思考要問些什麼問題，想想還有什麼要繼續追問的，觀眾和讀者又可能更關注哪些方面，等等。事前做了這類基本資料搜集後，就可

以正式採訪有關人士。當然，正式訪問前如有時間，都會先通過電話談一會，對他有大概的了解，想一想應該怎麼問。

問：你認為新聞行業需要創意嗎？

答：我覺得要有創意。當然一些「死人塌樓」、正正經經的平板新聞就很難用到創意，但如果是做特寫或有人情味的故事，我覺得就很需要創意。做一宗新聞時，要思考怎樣跟進，這其實需要有些創意思維才能想到獨特的角度。例如一次有線電視新聞報道「牛丸沒有牛」、「魚蛋沒有魚」，這就是一種大膽假設。要跳出常規，質疑一些傳統的東西，才會有如此大膽的假設，並為此作出驗證。這些故事就是先有創意才能做好。真開始寫的時候，如何寫得好看也要靠創意。那時我整天都在做內地收購土地的新聞及相關的上訪事件，有個片段講述農民耕地被收購後感到無聊，於是拍些垃圾戲自娛一番，是笑中有淚的故事。農民導演拍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聊着聊着才知道，原來收地後很多人的生活都變得很無聊，他們就拿出幾千元拍片，大家做義工，誰也不掙錢，但大夥兒都很興奮。同一幫人，剛扮演完國民黨，衣服一換就演共產黨。

另外，有些講述當時有人拜祭自己死去的寵物，把它當死人一般，將其擬人化。在廣州有道士進行超渡、上香、拜祭等，我寫的不是超渡亡人，而是超渡亡狗。一開始看時，你以為道士在給人唸經超渡，誰知再看下去才知道是給狗唸經超渡，說是在靈界裏，燒東西可以令死去的狗受惠。

問：你寫這些故事時有沒有遇上掣肘？

答：有的。有一個雞年，我寫過一篇關於鬥雞的故事。用「中國拳王六師弟對決泰拳」、「鬥雞拳王」等詞，以武俠小說的形式寫，講到如何拳拳到肉，怎樣連環拳等，繪聲繪色地講故事。但最

後編輯覺得太暴力了。我在結尾還提到這個中泰鬥雞拳王比賽如何點到即止，嚴禁使用暴力，不許有流血場面。但編輯仍覺得寫得太過火，表達手法過於暴力。

基本上，在無線電視工作，說不可以就真的不可以。而在有線電視，至今還沒有這種情況，環境很自由。一般來說如果我要做些很敏感或態度立場很鮮明的故事，雖然想題目可以有創意，但當時負責報道核試的危機和遺害，曾參與核試的軍人的後遺症等，我就要盡量想一些題目是別人基本上沒做過，而且與社會有關係的，因為那時福島核事故剛發生不久。處理這個故事不能使用什麼創意的手法。當然，故事的鋪排要吸引人，要有很多起承轉合，一些「特效」等，令人看了覺得有興趣再看下去。但就不能用搞笑出格的手法處理，只要抓緊故事的基本元素就可以了。

問：你為什麼選擇修讀新聞？

答：一開始沒有什麼非常清晰的概念，在中學時接觸過辯論，頗喜歡時事。不太想從商，而想做記者。不過當時最希望成為警察，第二才是記者。到選科時因為喜歡時事，就選擇了新聞。也曾想過讀經濟，並非因為我對投身商界有興趣，而是覺得經濟有趣而已。當時決定讀新聞，基本上沒受什麼人影響，因為周圍沒有人這樣做，也沒有人支持我這樣做，老師都奇怪我為什麼會跑去讀新聞。那時我只是純粹不想讀我認為沉悶的科目，加上對時事有興趣才會直接選讀新聞。其實我覺得影響我的是 basic 原則之類，如新聞道德教我要公正，為社會發聲，公平及平衡等。

問：你認為在學校所學到的會否阻礙創意的發展？

答：我覺得沒有。老實說新聞的守則或是理念純粹是一個比較宏大的價值觀，在那個價值觀中其實有很大的空間可以發揮。比方一些無關痛癢的新聞，當時羊年，想想羊年能舉辦些什麼活動，原來有些地方真有賽羊的活動。我寫的時候就像寫賽馬一樣，「灰羊對黑羊、又對白羊」，用很生動的方法，當中有很多搞笑的地方，現在不記得了。但我真的會熟讀那些妙句，這些就可以「盡情地玩」。當然不可以侮辱動物，要寫得可愛。另外，狗年時我寫過一篇「中國狗王」。那個號稱「中國狗王」的人殺狗無數，自己卻不吃狗肉。在狗臨死前他會摸牠們的頭予以祝福，他殺狗賣肉，當時江蘇徐州有一整條街都在賣狗肉夾餅早餐的。

問：作為一個讀者，你覺得看新聞報道最基本的元素是什麼？

答：第一，新；第二，夠不夠深入；第三，看那新聞的位置如何。如果一宗新聞被放得好大，又有相片，你會覺得這個新聞很重要；如果放得很小，你可能直覺上覺得沒那麼重要。

問：一個新聞最基本具備哪些元素才可以吸引你的眼球？

答：首先題目一定要起得吸引人。第二是相片，網上或電視上一開始的畫面能否吸引眼球。如果是文字新聞，真的要看開頭的文字寫得有多好，如果我覺得首幾段文字都是慣用的手法，那就不用讀下去了。電視也一樣，如果一條新聞同樣報道方式很「官方」，那麼我覺得後面已經沒什麼看頭了。一般來說，導語或者首段文字一定要寫好，這樣你才會繼續追看下去。我們閱過首段後，就已經知道是否會繼續看下去了。

問：對你而言，傳媒公信力是什麼？有什麼不可缺少的特點？

答：我覺得傳媒公信力首先就是要有真正的獨立編採方針，不受上司、政府甚至商業利益的影響，是獨立運作，純粹由一些資深管理人員憑多年新聞編輯的經驗作決定。第二，我認為負責人的年資不可缺少。例如一宗非常重要的新聞，關於現今政制、中國問題等，若交給一個新人，就不如讓一個一向處理政治問題的資深的人來處理，資深的人會參考過去做這類新聞的經驗，有很多相關故事，那麼就比較有公信力。另一方面，要看傳媒是否有屬於自己的新聞故事，不單止做些大家都在做的報道，而是有自己的調查、跟進及發掘，這個傳媒就不是得過且過。其他如傳統新聞的基本標準等，都是很重要的，難以排列先後，例如準確、平衡報道等，大致就是這樣。

問：你覺得所謂的新聞自由是指從什麼限制下解放出來？哪個傳媒能夠成功做到這一點？

答：新聞自由其實就是我剛才所說的第一點，編採方針真正獨立，不受新聞編採室以外的管理層、政府、廣告客戶或者其他商業利益左右。真的純粹從新聞角度及多年累積的經驗出發，對每一宗新聞作出操作判斷，即這件事要不要「玩大」、「採用什麼角度」、「寫多少篇報道」、訪問多少人等，這要擺脫外部干預，沒有編採室之外的力量干預才有新聞自由。而且我覺得要有強大的法律保障，有自由採訪的環境。如果揭露黑惡勢力你會「被人砍」，那就是制度上沒有安全保障，記者有做新聞可能會受到報復的憂慮，就未必敢去實行新聞自由。此外就是確保不會因此而被開除，所以這牽涉到媒體人的人身安全和工作保障。例如當年我寫某地產商，要不被對方封殺廣告，都需要有制度的保障。沒有一個機構可以完全做到，但有線電視相對好些。以我的觀察，電台好像有更多採訪自由和編輯自由。而電台比較

受局限，人手流失得很快，我不知道是由於編採方針還是人手不足的關係。

問：有人說「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普世價值，主要指西方傳媒的理論、理念、工作方式和價值觀，又被稱為一種傳媒帝國主義表現，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答：我自己不太覺得有這種帝國主義或者強制灌輸，因為資訊在香港是多元化的，一個機構只不過是向讀者、聽眾、觀眾提供一個資訊渠道，而這樣的渠道是非常多的。他們不喜歡看就可以不看，有權選擇及稀釋，光譜是很寬的。所以所謂強制灌輸，傳媒一定是單一的。強迫你看，是因為沒有別的選擇，否則我覺得未必能做到。當然有人說傳媒有所謂的第四權力，疑似是很大的權力，我則認為傳媒在做一件對公眾有利的事時是有權力的，也許可以與一些當權者當面交流，能較快接觸到有關政策。當我們有這樣的便利條件時，我們同樣有責任代表不能在前線發聲的人監察和質詢當權者。我們的工作並非為了私利，而是為了公眾利益，從這樣角度去論述，第四權力其實是種責任。這種權力沒有明文規定，當然《基本法》有保障香港居民新聞自由的條文。這種說法當然又是泛泛而言，並非傳媒有監察權力去要求政府怎麼做，沒有這樣的承諾和約定，只不過是大家有共識，覺得政府在某種程度上要向傳媒負責，或者向傳媒披露一些消息，其實就是在向公眾負責，以及透過傳媒讓公眾知道這些消息。

問：你覺得為什麼本地人關心本地新聞而不十分關心國際新聞？

答：第一，我不知道外國是什麼情況，他們是否關心國際問題，對於這點我有少許疑問。每個地方的人一定會主要關心自己本地的新聞。某些地方例如美國，地方這樣大，他們所關心的事情甚至可能只是自己附近幾條街的事。我覺得這是個普遍現象，

在很多地方都是這樣。但香港不關心的程度到底如何我就知道了。第二，國際因素會影響香港，例如財經、息口等。我覺得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但在整個國際格局中，除了經濟範圍可以真的對我們有影響外，其他的都未必有太大影響。

我們的國際參與程度當然不及美國和內地，我們只能作為一個經濟體系去參與一些國際組織，而我們在國際上亦難有什麼發言權。這不是我們的主要發展方向。而日本很關心自己的國際空間，特別是與美國的合作、和中國的關係等。這些都是應該的，因為地緣政治對他們很有影響。我認為台灣也相對較為關心國際事務，因為他們設法突破局限，希望擁有更大的國際空間，有自己的身份。但香港沒有這個問題，香港人對國際事務未必會很關注或有興趣知道。尤其有些人對內地有一種情緒，例如中國就聯合國某個議案有某種表態，各國的意見可能並不一致，也許是某種中國因素的作用，別國可能反對中國的建議或者會投棄權票。香港人會關心更多內地的事情，因為這對香港的政策及香港人的生活、經濟的關係很大，與中國的關係凌駕於其他國家之上。

個人代表作

此作品為新聞專題紀錄片，當年在香港有線電視播出，內容是有關中國內地核試的遺害，呂秉權憑此專題紀錄片「核試遺害」奪得第十六屆人權新聞獎電視大獎。

《核試遺害（上集）》（節錄）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國成功試爆第一顆原子弹，官方一直歸功於「兩彈一星（原子弹、氢弹、人造衛星）元勳」，鮮有提及數以萬計曾參與核試的軍人。部分退役軍人冒險向我們投訴，懷疑核輻射長年危害他們身體，令他們患癌、死亡，甚至遺傳疾病到下一代。這些軍人當年曾簽署保密協議，要將秘密帶進棺材，隨着相關資料近年來解密，他們說歷史應該知道核試的遺害。10 月 16 日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弹成功試爆 47 周年紀念日。1964 年這一天，中國成功打破超級大國擁有核武的壟斷，擠身國際核武俱樂部。

1964 年至 1996 年 32 年間，中國總共進行四十多次核試，經過數十輪戰機投擲、導彈發射、地面、地下和洞穴核試後，中國充分掌握全球先進核武技術，成功擠身世界核武大國，終於在 1996 年 7 月 30 日，中國向全世界宣佈暫停核試驗。在過往 32 年核試歷程中，數以 10 萬計軍人秘密參與任務，在核污染環境長期工作，他們進食的食物、飲用的水亦受輻射遺害。幾十年後的今天，這班退役軍人打破沉默，冒險講出當年的真相，以及今日疾病纏身的痛苦。

「我的肚子整個是人字型的，上面全是瘤。我們死了，死了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病因的。羊、馬被放射性照了很多，就倒在地上，就吐白沫。向在研製過程中獻出了寶貴生命的烈士們表示最深切的懷念」。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是中英美法俄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這五大國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全部都擁有核武。中共歷代領導人對核武相當重視，毛澤東在上世紀 50 年代說過，在今日的世界，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這個東西。在艱苦時期發展核武，元帥陳毅就講過，「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名句。1988 年，鄧小平說如果 1960 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兩彈一星，就不能夠稱為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國。

1990 年代，江澤民表揚兩彈一星元勛，我們特別要向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向已經過世的、為兩彈一星事業作出卓越貢獻的老一輩科學家和領導者、組織者，向在研製過程中獻出了寶貴生命的烈士們表示深切的懷念。

在兩彈一星元勛背後，其實有數以 10 萬計軍人秘密參與核試驗。這批核試部隊有一個編號，叫 8023 部隊。石家莊軍械工程學院新概念武器研究所前教授王瑩 1960 年代起，秘密參與中國頭七八次核試。「我被保送到大學的時候，就學原子能。我們在那兒唸了五年，畢業以後正好國家八哈軍工、從哈爾濱工業大學找搞原子能的人，正好我們學這個專業的就被選中了。當時我們有九個人進入核實驗基地。當年的核試場地，位於新強羅布泊沙漠，而 8023 部隊的駐紮地點都沒有標示的神秘地方——馬蘭（位於新疆）。當時，王瑩就在 8023 的核研究所工作，我們都向黨作過保證，都寫過志願書，最重的一個口號叫『三獻』，獻哪呢？獻紅心、獻青春、獻子孫。上世紀 50 年代中蘇交惡，蘇聯撤走協助中國發展核技術的專家、設備和圖則。中國靠海外歸國的科學家帶領軍方，花少於十年時間籌備第一次原子弹試爆。毛澤東當時就說

了，他說搞一個原子彈，我看要十年工夫完全可能，真正是沒到十年就出來了，就是第一次核爆炸，準備了好幾個月，都安裝好了。指揮部決定零時了，零時前就撤出場區。當時出事故的事也少，也可能沒有報道，咱們不知道，所以就沒想過，就認為這次實驗肯定百分之八十能成功。這是咱們私下講，沒有跟領導說什麼的。你要是跟領導說這個，可能還有百分之二十失敗。

1964年10月16日，早就由專列和軍車運到新疆基地的原子彈，進行最後的架接工作。專家將原子彈升上百多米高的鐵塔，再插上高壓雷管，之後，爆心範圍進行疏散。在北京的領導人、新疆的科學家和官兵迎接這個歷史性時刻：（五、四、三、二、一，起爆）（毛主席萬歲）（我們試驗成功的消息）（來到北京了）（周總理來電話）（向黨中央、毛主席、國務院）（共同參加這個實驗的）（全體同志們祝賀）（毛主席萬歲）確實有一道閃光，先看到，光傳得快呀，一看到閃光，心就落地了。我們準備這麼長時間，沒有白準備。隔了一段時間，轟隆隆的響，衝擊波我們也感到了。當時在爆炸前，除了測試的，我們是搞測試的，搞探頭、監測。我們是監測伽碼射線，還有取樣，取樣當時就是坐飛機，爆炸蘑菇雲，從蘑菇雲穿過去，他們直接受輻射比較大，就是把爆炸的灰塵取過來。

首先看看，這很重要。趕快分析，確定爆炸成不成功。原子彈爆炸首先是放炸藥，起爆，炸藥一起爆，把兩塊鈾壓在一起，讓它超過臨界質量，才能產生裂變反應。原子沒反應，那只是化學爆炸現象，所以不久，可能一個小時左右，就對外公佈了。原子彈試爆後，官兵隨即進行核反擊戰演習，向爆心方向衝去。因為放射性照射，不會立即就死，除非像日本廣島、長崎扔的原子彈，照射積量大了，當時就死了。畢竟是核試驗，不是那麼着急的事，還有一定防護之類，不至於立即就死，不會像在場區我們試驗的動物。羊、馬照到那個，羊、馬在爆炸以後，輻射照了，照完以後，它們靠得

近，衝擊波，光輻射沒照上，但放射性照了很多，它就倒在地上，吐白沫了，可能死了。」73 歲的王瑩，在核試基地工作 18 年，期間進食大量蛋黃抗輻射，結果四十多歲時，三條心血管堵塞，證實患上冠心病。

1966 年 10 月 27 日，中國進行首次導彈核試，是全球首宗在本國國土進行的同類實驗，而之前美國和前蘇聯所做的，都在公海進行。由原子彈到導彈核試，美國用了 13 年，中國只用了兩年時間，結果核彈在羅布泊靶心上空五百多米成功爆炸。

來自北京，現年 62 歲的許靜茹，當日在現場觀看核試。在她當年的日記上，記下歷史這一頁。一人發一個大墨鏡，或是眼鏡、防護鏡。開始起爆的時候，人人全都背朝爆心，完了就覺得一股熱浪過來。新兵裏就我們倆進去，覺得我們班就我們兩個去了，好像覺得特別自豪似的。

（衝擊波是怎樣的？）熱浪，一股熱浪。過來了，撲面而來。

（地震似的？）沒有。當時是衝擊波比較什麼的。

（人能站得穩嗎？）能站得穩，離得很遠。

觀察與反思

1. 兩彈是上個世紀 60 年代的事情，而 50 年後的今天，記者依然能從中挖到有社會價值新聞。本文作者憑藉新聞嗅覺和多年在中國大陸的工作經驗，本能地把視線轉移到後遺症上，從而暴露出「好事」背後的「壞事」。我們可否用同樣的邏輯和眼光來看最近發生的一些正面新聞事件，如北京舉辦奧運、中國加入世貿、神舟載人宇宙飛船？這些事情有負面結果嗎？可以和它們的正面結果相提並論嗎？
2. 從訪談中我們能否看到報道角度和記者所屬新聞機構的關係？是否可以看到記者個人的價值觀和專業主義信念在報道中起到的作用？本報道的客觀性和主觀性分別體現在什麼地方？
3. 如果說任何一件事情都有正負兩面的話，記者應該更關心正面還是負面？為什麼？記者作為一個「打工仔」，在這個問題上有多少發言權？
4. 報道的第三段是以一個直接引語開始的，但記者並沒有提供任何講話人的信息，這點重要嗎？
5. 記者在文中幾次提到「秘密」，在訪談中，也把新聞放到權勢的對立面，強調監督、公正與自由。這樣看來，新聞或新聞平台（如維基泄密網站）是否可以超越當權者定義的國家秘密？百姓知情權與國家利益之間應該怎樣取得平衡？